

铜梁县志资料

第 55 期

(教育志专辑)

铜梁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铜梁县志资料

第 55 期

(教育志专辑)

铜梁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八月

37

K297.19

7439

V.55

目

录

概 述	1—10
第一篇 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	11—52
第一章 机构改革	14—17
第一节 县教育行政机构	14—15
第二节 区乡教育行政机构	16—17
第二章 教育团体	17—20
第一节 教育会	17—18
第二节 县教育工会	18—19
第三节 县退休教师协会	19—20
第三章 教育行政管理	21—52
第一节 领导管理	21—26
第二节 教师管理	26—33
第三节 教学管理	34—36
第四节 经费管理	36—41
第五节 教育设施管理	42—48
第六节 教育企业管理	48—52
第二篇 学校教育	55—154
第一章 教育宗旨及学制变化	55—63

第二章 教学研究	63—66
第三章 招生考试制度	66
第四章 幼托教育	74—80
第一节 方针任务和主要目标	74—75
第二节 幼儿教育的发展	75—78
第三节 托儿所	79
第四节 学前班	79—80
第五章 小学教育	81—108
第一节 小学沿革及发展	81—89
第二节 教 学	89—106
第三节 教会小学	107—108
第六章 中等教育	109—138
第一节 中学的创立和发展	109—113
第二节 职业中学的发展、经费及设施 ...	114—118
第三节 教 学	118—131
第四节 勤工俭学	132—136
第五节 抗日时期内迁中学	137—138
第七章 师范教育	139—154
第一节 师范校及其沿革	139—144
第二节 师范附属小学	144—145

第三节 教师进修学校	145—146
第四节 教师培训	147—150
附：铜梁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情况统计表	151—154
第三篇 社会教育	174—203
第一章 民国时期	174—177
第一节 民众教育	174—175
第二节 私塾	175—177
第二章 建国后的工农教育	178—199
第一节 扫盲教育	178—182
第二节 农民教育	182—186
第三节 职工教育	186—199
第三章 其他形式的社会教育	200—203
第一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0—201
第二节 函授、电大、刊授	201—202
第三节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铜梁分校	202—203

主 审：

主 修：刘本铨

主 笔：李国学

责任编辑：

概 述

教育是人类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生产建设和科技革命的重要工具。历来的政治家多重视教育，看重人才。但教育是上层建筑，它的发展改革，须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铜梁县从清末创办第一个新学堂以来，地方教育事业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历经了从封建科举到旧民主主义教育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两个历史阶段。

清朝沿袭历代旧制，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自鸦片战争（1840）以来，国势日危，西化东渐，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以废科举之议上奏，朝廷因而改革科举内容，递减中额，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兴学。次年，铜梁县并巴川、琼江两书院，于巴川书院址创办小学堂，城、乡仍遍设私塾。因科举未停，小学堂经学、国文尚属教学重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庭诏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后，县人见兴学改制，势在必行，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中学堂于小学堂处，小学也逐年增加，至宣统三年（1911），全县有高等小学堂2所，初等小学堂16所，私立小学堂3所。推行“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为基”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

民国初年，虽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改革学制和课程，整顿私塾等，但均时革时

兴时衰。兼之铜梁学校校长，教师多系清末遗老，科举出身，对学生仍教以“尊孔孟，法先贤”等封建礼教，又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官办学校发展缓慢，至民国十三年（1924），全县仅有公办中学1所，高等小学10所（含女校1所），初等小学91所，私立小学12所。

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有吴建庄等中共党员先后来铜，建立了中共铜梁县委，分布在城区及附近八所中小学任教。实行民主管理，改革教材，教法，在部分青年师生中，进行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救国道理，在铜梁教育界播下革命火种。又由于在民国十四年（1925）四川省官产清理处曾派员来铜迫卖济仓田产及试院讯署，至民国十六年（1927），县又设置官公庙产清理处，被迫卖官公庙产以作修筑马路费用，于是有产业的官办企事业、庙宇、氏族祠堂等，就用办学的方式来保住产业。到民国十八年（1929）底前，先后新办公立农职业初级中学1所，师范学校1所，初级中学2所，小学60所；私立初中2所，小学30所。并拟于县立中学增设高中，但未办成。

民国十九年（1930）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教育，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培养目标。在学校中进行党化教育，军训和童军训练，又曾实行会考，使学生埋头读书，脱离当时的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政治斗

争。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采取一系列反共措施。实行级任导师制，推行训教合一。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实行“新县制”后，全县为推行政教合一体制，由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保设国民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敌战区部分学校内迁，我县学校教育有所发展，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全县有中心校47所，国民学校492所，私立小学11所；有公办中学2所，初级农职校1所，简易师范校1所，私立中学5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后，工农业生产下降，货币急剧贬值，人民生活困难，政府财政支绌。全县教育经费有所裁减。民国三十八年（1949）经县参议会决议，裁减学校三分之一后，全县有公办中学5所（含省立1所），师范校1所，初级农职业中学1所，私立中学3所；中心学校48所，国民学校292所，私立小学40所（其中完小8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六年来，铜梁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不但改变了民国时期学校数量少、规模小、设备简陋的状况，而且坚持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教学内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使教育质量逐步提高。

1949年12月，铜梁县人民政府成立，接管公办中小学后，即宣布废除训育制度，撤销训育处，取消童军、军训、公民课。组织教师参加一系列政治运动，利用寒暑假组织教师学习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改造思想。与此同时对学校进行初步整顿；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开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逐步加强学校工作的计划性。教学秩序逐渐形成。随着农村土改、农业生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入学人数增多，学校数量也相应增加。到1952年底，全县有公办中学5所（含当年接管的私立建业中学），学生24班（其中高中3班），1147人（高中100人）。小学由接管时的278所，496班，学生15400人，发展到454所，739班，学生33256人。政府严格限制私塾，私立学校全部停办。尔后，除继续进行政治运动，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外，大力宣传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思想。继又调整学校布局，为方便农民子女就近入学，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学校工作中，逐步明确教学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领导面向教学，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经过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到1956年底，铜梁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大，全县有完中1所，区初中3所，共高中8班，学生399人；初中48班，学生2338人。小学经过整顿，有公办400所，915班，学生43029人，民办163所，260班，学生13073人。

这个时期，工农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县成立扫盲办公室，区、乡成立了冬学工作委员会，村成立校务委员会，培训了大批扫盲教师，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到1954年共有冬学839所，民师1997人，学员40206人，常年民校211班，民师489人，学员12433人。1956年，县扫盲办公室增设专职干部，区配置了专职扫盲教师，在全县开展“同音连词”教学法的识字运动。

1957年到1961年间，铜梁的教育发展过快、过猛，与农业生产水平，尤其与这几年农业连年遭灾减产的现状极不适应。特别是1958年，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大跃进”，到1959年，全县有完中1所，师范1所，区初级中学6所及附设初中班2所，在校学生3240人；小学共782所（民办349所），其中高完小122所（民办63所），初小660所（民办286所），在校学生89416人。在这一时期中，铜梁教育战线，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过偏差。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11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否定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提出以大办钢铁为中心，强调各科教学都要实践，出现了以劳动代替教学，以学工学农代替学文化的倾向；1959年，不仅未纠正“左”的错误，反而大反右倾，并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又一次挫伤了部分学校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

1961年秋，铜梁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把适当压缩数量与提高质量结合起来，采取停办、合并、压缩、减少招生等办法精简在校师生，以达到巩固的目的。暂时停办区中学4所，民办中学2所，附设初中班2所裁撤。两所中学压缩班级，尚存完中2所，区初中2所，有高中16班，学生791人，初中33班，学生1686人。高完小62所（民办3所），初小376所，在校学生37289人，其中高小10127人。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学校教育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发展，1962年秋，停办各校陆续恢复，并适当发展民办学校。1964年贯彻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学校教育的指示，不仅公办，民办学校有所发展，农村耕读小学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到1965年底，全县有完中1所，师范1所，区初级中学8所，民办初中28所，农业中学2所，在校学生6502人（含高中150人，师范225人）。公、民办及耕读小学共1536所，其中高完小85所，初小1451所，在校学生共88440人，其中高小12123人，初小76317人。

1966年7月，全部中学教师和半个县的小学教师全部被集中在县城结合“四清”运动进行文化大革命，在教师中“横扫牛鬼蛇神”，发动群众斗群众，百分之百的人受到大字报围攻，20%左右的人受到批判斗争。接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中学普遍成立“红

卫兵”组织，建立造反兵团，小学成立红卫兵组织，造老师的反，教师也纷纷成立战斗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规模地斗“走资派”，各级领导班子瘫痪，各校相继自行停课“闹革命”。“打、砸、抢”愈演愈烈，武斗逐步升级，许多教师及学生遭毒打，部分学校教学设备，损失殆尽。1970年，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对教师进行“再教育”，接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全县1912名教职工中“挖出”174人，分别给予开除、清洗、撤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等处分。1974年“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把教师划入资产阶级范畴。

1969年和1971年，小学、中学相继复课。但在课程、教材、教学等都受到破坏。部分中学骨干教师下放到边远乡、村小学任教；课程设置曾一度砍掉外语、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等课，政治课占总学时的40%，语文课普遍上成政治课，改体育课为军体课，增设农基课；教学上是砸烂小课堂，实行开门办学，纷纷到工厂、农村大课堂去炼文、炼人、炼思想，全县厂校挂钩29处，校队挂钩911处，铜中、一中、师范等校，还到农村另建校舍创办分校。此外，时兴工农兵上讲台，还提倡学生上讲台，以打破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学校思想工作被搅乱，学生先参加打砸抢，继而学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白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在学校里斗“走资派”、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风、校风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坏的一个时期。

1971年，全县进行整党建党，学校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党的小组，9月，中共铜梁县委给各校加派党员干部，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进行了一些抵制，减少了损失。1972年，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在教学上，反对空头政治，学校认真抓“双基”教学，教育质量又有提高；1975年，又对学校进行整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软、懒、散”作风，克服了领导班子涣散软弱的状态，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学校又大抓了一段时间的教育质量；学校数量也有所发展，全县有常年性幼儿园7所，公社完小68所，且均附有初中班，共98个，村小565所，区初级中学8所，都附设高中班，高完中3所，师范校1所，教师进修校1所。

“文革”期间，扫盲机构瘫痪，工作停止。虽曾办政治夜校，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学军事，但实际上只学毛泽东著作，批判资产阶级。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铜梁教育经过拨乱反正，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教师政治待遇，恢复了统一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大大激发了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积极性，中学恢复“三、三分段”，小学“四、二分级制”，按“文革”前的

科目开课。狠抓“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技巧）教学，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自1977年起，中共铜梁县委、铜梁县人民政府按年召开教育先代会，表彰做出优异成绩的教育工作者。1979年起开始按分配指标转部分民办教师为公办教师，并给公办校教师晋级。同年九月文教局再设教研室，加强对全县教学工作的领导，1980年，铜梁县教育局、文化局分设，教育局继续贯彻《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1983年，县委、县府贯彻省府“农村、厂矿、企业交缴办学经费问题”的指示，很快在全县范围内掀起集资办学的热潮，1984~1985两年里全县共集资384万元，全县新修了校舍26210平方米，危房拆除重建24605平方米，添制木质课桌凳36363套，打三合土、安石板地面37491平方米，修建围墙4104米，修道路31295米，还添制了其他一些教学设备，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84年，中、小学领导班子进行改革，经过较大的调整，学校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有较大的进展。1985年，中共铜梁县委、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县、区、乡各级，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加强对所属地区学校领导、管理和检查工作。”并规定：“铜中、师范、进修校由县直接管理；各区单设中学（含农职业中学）由县、区共管，以县为主；巴川一小、巴川幼儿园由县、镇共管，以县为主；乡属初中、中心完小，乡属幼儿

园由区、乡共管，以乡为主；乡以下的村小，由乡、村共管，以乡为主。……”。是年九月十日，县委、县府指示各区、乡隆重庆祝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提倡尊师重教。

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铜梁的教育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到1985年已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扫盲教育成绩显著，已成为基本无盲县，其他形式的成人教育，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第一篇 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

第一章 机构沿革

第一节 县教育行政机构

清末，县级教育行政机构是儒学教谕署，简称“儒学署”或“学署”，俗称“学老爷衙门”。铜梁县儒学署原在凤山关岳庙（现文管所）右侧。儒学署设教谕一人，掌管文庙春秋二季的祭祀，训导所属地方生员。

在正南街侧还设有试院（现体育街处），是清末县学署为童子举行岁试的地方，俗称“考棚”。院旁空地辟有射圃，建有亭子、雨棚；另在明月桥筑有较场一处，演武厅一座，作为岁试武考的场所，俗称马道子。

光绪三十三年（1907），儒学署更名劝学所，本县举人雷象震（人龙）任学务总董，下设劝学员四人，诱劝地方绅士捐资兴学。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11月25日铜梁县成立临时军政府，改劝学所为军政府学务科，推前清秀才、四川通省师范毕业生刘祖泽（鸿来）为科长，处理教育事宜。民国元年（1912）2月，改学务科为劝学所，迁住正街生明亭（现百货公司处），劝学所负督导全县兴学之责。

民国十四年（1925），省令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地址仍旧。设局长一人主持局政，视学四人巡检各区乡教育工作。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为提倡女权，通令各机关法团均须任用女职员，教育局遂先后委任本县知识界妇女李光燕、李思成、向淑娟为女视学。民国十九年（1930）视学更名督学。

民国二十二年（1933），教育局奉令改局为科，由生明亭迁入县政府内办公。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蒋介石入川后，以“川政统一”为由，通令县政府合并教育建设两科为第三科，设科长一人。科内还设置计量鉴定和收音两室。

民国二十九年（1940）颁行新县制后，第三科重分为教育、建设两科。民国三十六年四月省颁各县市教育局组织规程规定，应再改科为局，并扩大机构人员编制。因铜梁县参议会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升局扩编，所以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二月铜梁解放时止，仍称教育科。

1949年铜梁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初设文教科主管教育文化事业，有科长一人，工作人员五人，多数抽调下乡搞中心工作，仅留一至二人常驻机关处理文档、财会事务。1952年，工作人员始分为科员办事员两级。是年冬县府成立扫盲办公室，设置专职主任一人，与文教科合署办公。不久此机构撤销，只留工作人员一人在文教科统一管理下办理扫盲有关工作。1954年秋，文教科设置扫盲办